

The Constru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terpersonal Network and the Generation of Revolutionary Emo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hrough Zhang Yong Fu and Lim Nee Soon

Qian Shanshan^{1, a} Ho Kee Chye^{2, b*}

¹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²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a qianshanshan@u.nus.edu

^{b*} hkeechye@um.edu.my

ABSTRACT

Taking Zhang Yong Fu and Lim Nee Soon as examples, the revolution trend of overseas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s the reflection of different personal orientations and different interpersonal network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social factors, the revolutionary emotional orientation of the Nanyang Chinese is reflect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Interpersonal Network, Revolutionary Emotion, Zhang Yong Fu, Lim Nee Soon

新马地区华人革命情感与中国人际网络建构 ——以张永福、林义顺为对象

钱杉杉^{1, a} 何启才^{2, b*}

¹ 马来亚大学文学与社会科学学院, 吉隆坡, 马来西亚

² 马来亚大学文学与社会科学学院, 吉隆坡, 马来西亚

^a qianshanshan@u.nus.edu

^{b*} hkeechye@um.edu.my

摘要

以张永福、林义顺为对象为代表, 新马地区华人知识分子未来革命走向的原因是不同的个人取向与不同的人际网络的共同作用的体现; 而南洋华人的革命情感取向, 又因历史、政治、社会因素的作用, 具有不同的历史分期脉络的体现。

关键词: 海外华人, 人际网络, 革命情感, 张永福, 林义顺

1. 前言

学界有关海外华人与革命史的研究, 越来越把革命情感作为一种话语和方法, 将南洋华人知识分子的革命走向研究范式化、程式化, 对于不同、其中的特征的讨论则较少。具体而言, 其一, 单一中心的理论, 比如仅关注到中国本土以及新客华人, 忽略土生华人,

或是仅仅立足本地忽略了在地华人对于中国的影响。其二, 将土生华人的革命情感简单的范式化归因于民族主义。诚然, 民族主义能够很好的解释新客华人的革命情感, 但是土生华人的革命情感则不能范式化的归因于民族主义。史学即人学, 本文以张永福、林义顺为研究对象, 以比较史学的方法分析同一时期不同的南洋华人知识分子的革命情感的依托, 以精神史的研究思路考察华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个人生命

处境，将革命情感、人际网络进入历史研究，与个人走向做一互动性研究，以立足本地兼具国际视野研究思维、人际联系和历史考察新马地区华人知识分子个人走向的关键因由所在。

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同为星洲三杰，自同盟会成立至辛亥革命成功，张永福、陈楚楠是主要角色，林义顺主要负责对外联络上的宣传与交际，以及中兴日报的出资与经营。张永福生于 1872 年 9 月 5 日，1957 年 4 月 5 日去世，林义顺生于 1879 年 11 月 12 日，与孙中山同日，1936 年 3 月 19 日去世。

根据《南洋与创立民国》的整理，张永福继承张理“新长美”后，旅日期间决定在新加坡开拓橡胶业，成为新加坡橡胶巨子。张永福是同盟会前身——“小桃园俱乐部”主要成员，“苏报案”后，张永福与陈楚楠以“小桃园俱乐部”为名，声援章太炎、邹容，合办《图南日报》。此后，张永福与孙中山并住晚晴园，任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副会长，与汪精卫积极投身星洲书报社宣传，创办《南洋总汇报》，1906 年，张永福与孙中山并住晚晴园寓所，任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长，1907 年，张永福与陈楚楠、林义顺合办《中兴日报》，1910 年，张永福任同德书报社社长，1912 年，受孙中山旌义状，出任国民党新加坡名誉支部长。1924 年，出任端蒙学校总理，1933 年，完成《南洋与创立民国》，1938 年，张永福号召支持中国抗战，汪精卫投日后，张永福投汪，任中央监察委员，实任越南特派员，奔走多地，为汪精卫游说。1945 年，国民政府逮捕张永福，1948 年，张永福刑满后寓居九龙，1955 年出版《觚园诗集》，1958 年，《觚园耶许声》出版，后病逝^[1]。

根据《星洲同盟会录》的整理，1889 年，林义顺就读圣约瑟英校，后在张永福、陈楚楠、陈泰公司任职。1901 年，林义顺同阮碧霞成婚，1906 年，林义顺任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交际主任与外交主任。1913 年，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林义顺接待陈炯明及黄强等人。1912 年，林义顺接受孙中山旌义状，1917 年，出任大元帅府参议，1918 年，创办华侨中学，1921 年以及 1925 年，出任中华总商会会长，1927 年及 1931 年，任怡和轩俱乐部总理，1929 年，任潮州八邑会馆总理，1932 年，出任国难会议议员，1929 年，代表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1935 年，林义顺积劳成疾，1936 年病逝于上海，安葬中山陵^[2]。

选取张永福、林义顺为讨论的对象原因在于，首先，张永福、林义顺同为土生华人，著名爱国志士与革命侨领，并且具有未来革命道路选择与后世评价上的代表性，其中，林义顺的评价是正面，张永福的评价则是中性，或带有负面的，能够代表海峡华人的不同革命道路选择。除了具有代表性以外，张永福、林义顺共同在于，二人同为海峡华人，祖籍潮汕，生于新加坡，林义顺八岁前父母相继过世，由张理与陈宝娘带大，和母舅张永福共同接受私塾华文教育，深受中国文化的启蒙与熏陶，与再华化有密切的联系。也

就是说，血缘上，二人是母舅关系，生长环境上，共同由张理陈宝娘抚养，教育上，共同接受私塾华文教育，并且未来具有相同的信仰。不同在于，张理长子张永福继承张理大多遗产，林义顺继承部分遗产。此外，张永福承继父业，接受的是传统私塾华文教育，与张永福不同的是林义顺具有圣约瑟英校的英校教育背景。由此，一些学者认为，新马地区华人“回应模式”区别的原因是，是否接受了英校教育^[3]。

诚然，英校教育的背景是林义顺有别与张永福的因素，但是，若以二者共同的好友陈楚楠为例，陈楚楠与张永福经历一致——同为子继父业，接受华文教育的二代华人，陈楚楠在对待是否投日的态度上，则与张永福完全相反。由此，海外华人革命情感取向不能简单的完全归咎为是否接受英校教育，即西方现代教育，或是受到意识形态的作用与影响。我认为，南洋华人知识分子并非是单一的面相，客观的历史走向只有同情感、人际等非理性的因素综合，才能真正发现革命人的真确面相。换言之，历史走向并非既定好的一元化的单一线条的脉络，南洋华人的革命情感与人际网络前期具有较为单一的气象和格局，但是后期，因由中国历史发展呈现出的政治极化的现象，南洋华人知识分子处于种种不同政治团体冲突、对立的场域中，并非简单的理性化的成为某一政治主体的一员，而是在各自不同的情感取向、人际网络与政治诉求影响下呈现出的不同个人走向与历史结局。

张永福、林义顺的人际网络，关键是与孙中山的交集，1905 年孙中山经停新加坡经尤列引荐，与张永福、林义顺的正式见面，实际上，在会面以前，张永福、林义顺与孙中山的人际网络已经在逐步重叠。1899 年张永福参加邱菽园、林文庆组织的好学会，曾共同上书反对废黜光绪，1900 年康有为与日本刺客事件，孙中山抵达新加坡，与林文庆、黄乃裳接洽。同年，张永福与陈楚楠、林义顺在小桃源俱乐部评议政事，三人不支持康有为虚君立宪，逐渐认同孙中山区分满汉，民主共和。1903 年张永福、林义顺经黄伯耀介绍，结识尤列，看到革命期刊《革命军》、《苏报》、《皇帝魂》等等。1904 年张永福、林义顺合资创办《图南日报》，尤列任名誉编辑。1905 年孙中山致函尤列询问《图南日报》相关内容，同年，张永福、林义顺与孙中山会面，提到许雪秋、余既成、黄乃裳在潮汕的革命工作。与孙中山的交集是张永福、林义顺人际网络正式形成的开始，下表为二人的人际网络的整理。

表 1 SBD 张永福、林义顺共有非血缘人际关系整理

与张永福关系	人物	与林义顺关系
密切伙伴	孙中山	密切伙伴
密切伙伴	汪精卫	普通伙伴
普通伙伴	胡汉民	普通伙伴

普通伙伴	陈嘉庚	密切伙伴
普通伙伴	陈楚楠	密切伙伴
密切伙伴	张来喜	普通伙伴
密切伙伴	殷雪村	普通伙伴

数据来源: Singapore Biographical Database

从此表可以看出,二人与汪精卫、陈嘉庚、陈楚楠态度与交往程度是不同的,原因在于张永福、林义顺的个人取向与人际网络建构,分别有前后不同的阶段,导致了革命走向的不同。

2. 张永福革命情感取向与人际网络分期

张永福人际网络的建构,以张永福通电支持汪精卫分为前后阶段,前期是 1872 年至 1939 年与孙中山进行革命阶段,后期是 1939 年至 1957 年与汪精卫政权阻碍革命阶段。

张永福人际网络的前期建构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出逃,张永福出借孙中山晚晴园一事起。张永福的母亲陈宝娘赞成张永福出借晚晴园,“汝倒是有一点思想,能够认识顺逆的正理这样清楚,我实在是欢喜的。”^[117]孙中山构想的中华民国国旗,则由张永福夫人陈淑字亲手绣制,《良友》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也收录了《中山先生与张永福及日人萱野在晚晴园合影》,“当时晚晴园不仅成为革命经费的筹募中心,更扮演营救革命志士和安置流亡同志的避难地,比如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林义顺和张永福等人就安排 600 名志士撤退到新加坡,并成立中兴石山公司安置他们。”^[4]在此期间,张永福对于孙中山是甚为满意的,“同志中有许多反覆求详的质问,先生总不嫌烦的条分缕析,清清楚楚有根有据的解答,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使我们感到极度的满意。”^[118]此外,张永福与陈楚楠、黄乃裳、冯自由、胡汉民、汪精卫保持密切的联系,“先生昔年参加革命,与胡汉民、汪精卫二人,私谊甚笃;于汪精卫尤甚。”^{[2][116]}下表为《申报》刊载张永福新闻内容统计,此表统计的张永福为孙中山故旧,非“造船所工人”^[5]或“清江案匪”^[6]张永福。

表 2 《申报》刊载的张永福之相关新闻分类统计 (1872-1940)

新闻类别	报道次数										总数
	1918	1923	1925	1928	1929	1933	1934	1936	1937	1940	
实业			1								1
筹振									1		1
侨务							1				1
嘉奖		1									1
任职					1	1	1	3			6
社交			1			1		10			12
捐物									2		2
通缉										1	1
免职										1	1
其他	1			1							2
总数	1	1	2	1	1	2	2	13	3	2	28

数据来源:《申报》

根据上表,张永福在社交与任职上的着力程度远大于其他方面,着重任职表明张永福有很强的政治参与的观念,“一些南洋的革命领袖如张永福纷纷呼吁华侨继续扮演积极角色,不要只是把自己的革命辉煌史作为换取官职的勋章。”^[7]同时,张永福与陈楚楠正副会长的职位事件可以体现张永福前期取向,张永福年长陈楚楠十二岁,同盟会分会成立后,陈楚楠出任会长一职,张永福任副会长,但是,翌年改选以后张永福一直出任会长,陈楚楠则任副会长,一定程度上体现张永福的政治参与的积极主张。此外,1928 年济南五三惨案,新加坡侨界大为愤慨,积极援建中国建设,但是,张永福没有积极参加山东筹赈会运动,而是积极参与 1932 年张永福任监察主任的筹赈中国难民委员会,可以看出张永福的国民党本位革命主义,

以及张永福在任职上的着力程度。“张永福只能建和安柏同高的五层楼大厦,但当局允许他在大厦一角加盖圆屋顶,算是比邻居略高。”^[8]张永福的拟建蓝图,则可以看出张永福重优裕的秉性。并且,张永福重热忱情感,敬重孙中山故旧,“张永福君,对于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昨特发出徵文启事,大致谓孙中山先生,手创民国,立空前绝后之伟业,为吾族历史上从来未有之人物,惜天不永年,悠然长逝。”^[9]在筹措起义上,张永福在孙中山黄冈起义求款信后,与陈楚楠等人捐款三万余元,黄冈起义失败后,协助营救余既成,此后,在七女湖起义、汕尾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马笃山起义、河口起义等,张永福也多有捐款,河口起义失败后,安置收容起义军。张永福对于日本有较好的回忆,张永福胶鞋厂的机器来自日本,为筛

选机器，张永福曾多次往返日本，张茂德提到，其中一次，张永福曾看到富士山火山喷发的景观。

总体而言，在第一阶段，张永福的积极意义在于，辛亥革命前的中国革命，包括辛亥革命，张永福竭力参与中国革命与中国援建工作，以致实业经营亏损极大。其次，张永福非常注重情感化的，情感上的伙伴友谊，最后，张永福具有很强的政治参与的观念，强调自己能够参与实际变革。

张永福的个人取向与人际网络上的后期转变，则是张永福参加汪精卫政权。学者比较关注的是1939年张永福出任汪精卫中央政府中央监察委员，是张永福正式投日的表现。实际上，张永福倒向汪精卫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此前的活动范围、个人取向和人际网络，已经在逐步与汪精卫趋同。1924年张永福返回汕头任银行行长，1926年张永福担任汕头市长。换言之，张永福作为处于历史激变的阶段的个体，面对蒋汪的强烈的对抗性，在对抗的背后是无法脱离的自我缠绕的窠臼。张永福既有自身强烈的参与政治与任职需求的愿望，又基于汕头工作时所切身感悟到的种种腐败现象，现实层面上，张永福并不认同身边的人、现象、体制，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绝对的认同自身信仰的政党、主义，因此，这一时期，张永福不满于国民党施政以及内部的贪腐现象，因此，诉求于与蒋介石有别的汪精卫等早年交往密切的革命同志，“张永福1932年搬回中国后，又与早年的革命同志胡汉民、汪精卫等保持联系。”^[10]

下表为《申报》刊载张永福新闻内容统计，此表中的参政、嘉奖、社交、其他项的新闻类别，统计是张永福在汪伪政权的相关活动。

表3 《申报》刊载的张永福之相关新闻分类统计 (1940-1957)

新闻类别	报道次数			总数
	1942	1943	1944	
参政		3	1	4
嘉奖		1		1
社交			1	1
其他	1			1
各年新闻报道总数	1	4	2	7

数据来源：《申报》

这一时期，国民党对于张永福投汪的报道，则将张永福等同汉奸身份，“据报告，敌今拨港币二万元，收买张永福使其通电响应汪逆精卫之卖国主张……本部以张永福为身属党员，今竟甘为敌寇工具，自毁革命历史，倒行逆施，特通令海外各党部报馆会同使领馆，对此汉奸危害国家民族之行为，严密防范。”^[11]这一时期，蒋政府对于张永福的报道等同于收港币两万叛变的汉奸身份。除张永福本身的投日行为外，报

道也与蒋政府不重视任用张永福等南洋的华商、知识分子有关。汪精卫政权对于张永福的任用则较为重视，比如“连同国府委员张永福氏赴越南推进侨务工作，该学员等正准备一切，不日即可就道。”^[12]以及“国府委员张永福氏，奉派充任驻越南通商代表，以出国赴任在即，侨委会褚兼委员长特于十月十日中午，在中日文化协会，设宴款送。”^[13]事实上，汪精卫政权的任用满足了张永福的任职需求与积极的政治参与的需要，张永福的个人取向对于政治转变是较为关键的因素。

在第二阶段，张永福在中国期间发现国民党当政与理想的行政模式有很大差距，国共二次合作更是使一向反共反蒋的张永福极其不满，与张永福旧有情义的汪精卫，此时提出亲日反蒋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并决议委任张永福任国民政府委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满足了张永福的任职需求、重“革命伙伴”情感与国民党本位的革命情感。

综上所述，影响到张永福的革命情感与革命转向，自身的个人取向与人际网络建构是最大的原因，首先，张永福积极参与政治，在任职上的着力程度远远大于其他方面，此外，他注重生活优裕富足，因为经商，对于日本也有很好的印象。最关键的，张永福秉持的是国民党本位革命主义，捐款捐物也是针对性的对于国民党的援助。张永福的个人取向与人际网络建构前后分期明显，前期是积极参与革命事业，疏于实业，人际交往以革命伙伴为主，后期是参与汪精卫政府，积极参政，破坏革命。

3. 林义顺革命情感取向与人际网络分期

林义顺的人际网络建构，以同盟会支部转移槟城，以及张永福、陈楚楠几乎破产为界的前后阶段，前期是1879年至1911年的完全的参加革命阶段，后期是1912年至1936年注重实业以及发展人际的阶段。

前期，林义顺曾陪同孙中山在芙蓉、吉隆坡、怡保等马来半岛各地宣传革命，林义顺义顺庄的湛华别墅，是林义顺接待反袁南来党国要人住所。值得注意的是，1904年林义顺曾返回潮汕宣传革命发展余通、陈湧波，“同乡情谊加战斗同志的感情，使他对这两位革命友人特别关注。”^[14]与此相同，林义顺创立八邑会馆，体现出林义顺有明显革命地域主义情感。1906年林义顺受孙中山的委派，在槟榔屿会面侨领吴世荣，成立同盟会分会，吴世荣任会长，受到孙中山赞扬。1907年《中兴日报》创刊，林义顺任第一任总经理，居正、胡汉民、汪精卫曾先后任主编。1909年林义顺为解决《中兴日报》资金周转问题，决定以有限公司的方式运营《中兴日报》，定股二万元，与胡汉民、汪精卫在各地募股，得到孙中山支持并主理实行。

在第一阶段，林义顺出于亲友鼓动和教育因素，往返各地，全力投身革命，全力参与起义的筹备与后援工作，结交发展革命同志，比如陈楚楠、胡汉民、汪精卫、吴世荣等。

林义顺的后期转变,则是目前多数学者所没有关注到的变化,或可能林义顺是因为同盟会南洋支部转移檳城,有鉴于张永福、陈楚楠对于中国革命事业财力物力人力投入巨大,以致破产,因此,林义顺的革命活动实际上并不如前期的投入,而是注重实业、发展人际。根据黄贤强教授的研究,后期,林义顺往返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行程约有十次,1917年9月至11月林义顺经上海前往北京,受到政府要人接见,获得中国政府的支持,在海南开垦种植橡胶,获称华侨归国创业典范。1921年10月至11月林义顺受中华民国制糖公司的邀请,以中华总商会会长的名义发表演讲,后继续前往北京。1926年11月至12月林义顺台湾一行,行程为:新加坡—香港—厦门—基隆—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竹—台北,林义顺在厦门受到林文庆的接送,下榻鼓浪屿中英酒店,并参观厦门大学。林义顺台湾一行,参观木宫町神社、圆山公园、北投温泉、台湾博物馆、台湾商品陈列所、台北公园、台湾植物园、台北专卖局、帝国株式制糖工厂、农事试验场、南公园、开元寺、台南神社、孔子庙、赤坎楼、安平港、安平制监会社、万寿山、吴凤庙、阿里山、新竹实业共进会、农工官、角板山、台北中央研究所;林义顺台湾一行是有目的的,一是在充实人脉网络,台湾四大家族有两个接待了林义顺,受辜家辜显荣在台湾最大的酒楼——江山楼接待,受板桥林家林薇阁接待,数次拜访台北专卖局松下芳三郎,拜访淡水黄东茂子黄金水等人;二是发展实业,林义顺前往台湾商品陈列所、台湾植物园、帝国株式制糖工厂、中央中究所等地,取得樟脑,相思种子归植南洋^[15]。

同样的,根据林义顺的姻亲关系整理也能够发现,林义顺人际网络的经营程度之深广。其中,林义顺育有四子六女,长子与陈嘉庚女陈丽好成婚,次子与李俊源女李宝娘成婚,四子与菜源水女菜舌娘完婚,长女与黄仲涵子黄忠宗成婚,次女与薛中华子薛梦熊成婚,六女则与陈宗器子陈学图成婚。总体而言,相较前期,林义顺后期重实业与交际,不重革命和任职。

对于林义顺的评价,无论生前死后、还是现在都是非常肯定的,1929年2月林义顺经香港、广州、上海至北京参加奉安大典,据《前南洋同志会代表林义顺祭中山先生纪》记录,林义顺代表的对象包括郑聘廷、陈嘉庚、陈楚楠、林文庆等会员,以及华侨银行、华南银行、醉花林俱乐部、怡和轩俱乐部等。据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的档案记载,中国政府安排陆军少将作为林义顺的护卫,在北平欢迎南洋华侨代表林义顺的摄影中,林义顺旁边是胡适^[15]。1936年3月4日至19日林义顺经香港至上海,病逝于上海,归葬中山陵。

总体而言,在第二阶段,林义顺出于同盟会起义数次失败,檳城取代新加坡成为南洋同盟会中心,有鉴于张永福和陈楚楠重于革命,疏于财力,以致业务经营受挫,林义顺革命活动不如以往活跃,大多数的行程则是利用机会探访实业巨子与政界人士,着重发展实业与经营人脉。

综上所述,林义顺特征是重实业,重潮汕,重人际经营与平衡,重交际,个人取向与人际网络前后分期明显,前期是全力参与革命事业,人际交往以革命同志为主,后期则以兴办实业,注重发展人际网络为主,林义顺的革命走向,也是与个人取向以及中国的人际网络挂钩的。

4. 个案分析:对待陈炯明与孙中山

林义顺与陈炯明私交不甚密切,在前期,二人的联系大多是与其它革命志士的共同反袁活动,在后期发展实业阶段,林义顺与陈炯明相联系的重要人物是黄强,黄强是林义顺台湾一行随行者,黄强记录林义顺台湾一行的相关内容,出版《台湾别府鸿雪录》。黄强是陈炯明先后任命的粤军总部副官长、闽南护法区司令部总参议、粤军兵站总监、广东工艺局局长,1920年,受陈炯明推荐任粤海关总督,陈炯明失势后,效力国民革命军。

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陈炯明伐广州桂系,林义顺为其募饷三十余万^[14]。1926年4月,陈炯明曾题赠林义顺的“急公好义”是目前可见的陈炯明传世的唯一书法,但是,黄炎培、孙中山、汪精卫、黄兴、居正、吴迈、陈少白、吴敬恒等人,也皆曾赠林义顺墨宝并传世。1930年3月24日,陈炯明也曾致函林义顺。

张永福重故旧,林义顺与张永福对待陈炯明的私人情感是相同的,在陈炯明逝世时,张永福曾写《张永福挽陈炯明联》纪念陈炯明,“溯当年奉总理命命曾劲驰驱讨贼誓东郊敝屣都督尊荣豪杰如君能有几,洎此后违师座威严重遭谴责韬光隐南粤退甘平民生活英雄没世岂无闻”^[16]。

结合上文,林义顺与张永福对待陈炯明与孙中山的个人情感、私交等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在支持孙中山反袁或是支持陈炯明另立旗帜的选择上,林义顺与张永福的不同选择,则可以看出二者不同的革命取向。孙中山主张激进讨袁,黄兴则主张期以五年,缓进讨袁。1914年,陈炯明、李烈钧主张缓进,批评孙中山沉迷革命,不言救国。新加坡侨领虽然多不支持孙中山讨袁,强调要以日本为敌,但是,在支持陈炯明另立旗帜上,“除陈新政、林义顺、蔡焯三及客籍少数分子赞成外,多数同志反对彼等另树一帜也。”^[17]以至“星期州同志略分三派,陈、张君等为甲派;二林君等为乙派,同仁俱乐部为丙派。”^[18]学界普遍认为,国民党的急进讨袁与缓进讨袁政策,前者体现的是国民党本位主张,而后者体现的则是国家本位主张。我认为,这一不同的政治取向应用于林义顺与张永福,也能够体现张永福革命情感是国民党本位主张,林义顺则是国家本位主张,即个人取向是不同的革命选择的影响因素。

5. 个案分析：对待汪精卫与蒋介石

在逝世前，林义顺和汪精卫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交集多为与一众革命人士共同活动。比如，1910年汪精卫刺杀事败，陈璧君等人曾在成邦园居住，“此园乃陈楚楠君、林义顺君所有，清末汪兆铭君摄政王时，胡汉民君、陈璧君女士、吴世荣君、黄金庆君、吴应培君来星洲，讨论营救汪兆铭君之住宿处也。”1927年“陈嘉庚和林义顺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接待汪精卫。”^{[13]64}

与张永福不同的是，林义顺和各方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台湾国史馆档案记录，1930年4月30日林义顺致函请蒋介石为别墅题“蓬莱洲”三字，1930年5月21日国民政府回复林义顺“主席现赴前方”，此后，林义顺再次致函^[15]。在此意义上，不难发现，林义顺与汪精卫、蒋介石的关系皆较为良好。并且，除与蒋介石、汪精卫皆有来往，林义顺与宋子文、黄炎培、李烈钧、阎锡山、邹鲁、田桐、吴迈、张继、段祺瑞、李济深、黎元洪、周震麟、王宠惠等人也多有来往，无论是否具有争议，林义顺一概同等对待。

同一时期的张永福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则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张永福通电请蒋下野》的态度是极贬低的，“蒋主席，屡劝释胡，未获采纳，致启剧变，众叛亲离，危党乱国，咎胥在兄，又传募公债八千万，为征粤费，粤历有功于国，孰忍令其蹂躏，众情愤激，请即下野，以谢天下，张永福叩。”^[19]这一时期，同样在张永福看来有严重过失的汪精卫，张永福则以相对平和的态度，加以规训与劝告，“弟忝与兄交三十年，历受吾兄爱惠，闻此不胜悚惶，甚愿电讯失实，吾兄无意北上，不受宵小诱惑，不与敌人合作，保全同志等交谊。”^[20]即因为蒋介石筹措公债征粤与汪精卫北上事，张永福都具有微词，但是对于蒋介石一方，张永福用非常贬低性的词语批判，对于汪精卫一方，则是劝告的态度规训兄长。

张永福对待蒋介石与汪精卫的不同的叙事态度存在一种叙事暗示，蒋介石与新马地区华人联系并不深，汪精卫则与南洋华人联系密切，特别是在前期的交往与革命活动上，汪精卫给张永福留有好的印象。很多学者认为国民党联共的决定是张永福参加汪精卫政权的原因，我认为，侨界资产阶级诸如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陈新政等人皆曾对孙中山的联共主张均表示反对，但是，陈楚楠等同样是曾反对孙中山联共的侨领，但是在后期是否投日和是否支持共产党上，与张永福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甚至倒向共产党。在是否叛国投汪上，林义顺与张永福不具有比较意义，但是我认为，以张永福与时人的行为对比分析，张永福投汪原因在于，一是不满蒋介石，二是反对联共，三是对于汪精卫能力与品格的认同，四是不满于国民党的执政方式与产生的贪腐问题，五是出于自身的任职需求。总体而言，张永福与汪精卫的私交在张永福的革命情感取向上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张永福投汪实际原因还是个人取向与人际网络上的

影响。

6. 结论

张永福的个人取向与人际网络建构，以投日事件分为前后阶段，前期是积极作用，后期基于不满蒋介石政府，重视汪精卫与自己的革命传统，任职需要等因素，参与亲日活动，起到消极作用。

林义顺的个人取向与人际网络建构，以南洋革命中心转移，同盟会起义数次失败，张永福、陈楚楠重视革命，疏于财力以至破产，分为前后阶段，前期全力参与革命，后期则着重发展实业，经营人脉。

在革命情感上，基于不同的个人取向与人际网络，张永福的革命情感，是重“革命伙伴”式的，国民党本位的革命情感，林义顺则注重人际网络的经营与联系，奉行国家本位的革命情感，与不同主体保持了一种巧妙的平衡。在个人取向上，张永福更有亲身参与政治的取向，注重任职，并且对日本有良好的回忆，情感上则同情“死而后已”者，林义顺则更为“顺天应时”，注重经营实业，发展人际网络，无论对象是否具有争议，皆一视同仁，在革命情感上则受到“畛域主义”影响。林义顺不重任职的表现，部分学者认为，林义顺是有鉴于陈楚楠、张永福过于投身革命，疏于实业，几近破产的结果，因此对于政治参与与任职的重视程度不高，大多数的时人和学者，则认为是道德操守。不论林义顺是出于品格使然还是现实考量，在客观经济实力与人际的建构上，或者是在中国方面的认同上，相较于张永福，林义顺则更为成功的塑造了一个侨领的形象。以张永福为代表的部分侨领，革命情感带有原初性的超越的色彩，期望自身能够在革命的浪潮中共振并且对于政局有实际性的改变，而对于国民党的施政现象又具有抵抗感。林义顺内心的挣扎感则没有张永福强烈，而是保持着谦谦君子的形象。如此，南洋华人知识分子不同的个人革命情感取向与人际网络，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塑造了全然相反的政治选择、革命走向与结局。

综上所述，民主革命伊始，新马地区华人知识分子具有强烈革命情感与民族意识，但是，南洋华人的革命情感与中国本土的革命情感，并非是亦步亦趋的。也就是说，南洋华人知识分子个人选择与未来走向不是发现的，不是固有存在不变的，而是不断被认识，不断重构的过程。一方面，南洋因其具有独有的国际性与华人知识分子的资本的累积，又因远离中国本土具有法治上的有限性，成为革命者的存在的庇护空间。另一方面，从地方史视野考察，需要意识到人的有限性。换言之，地理空间的分野，恰恰也是时间的分野，也就是说，与处于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不同，南洋华人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消息来源是片面的、有限的，据此产生的行动与反应无法与中国本土知识分子衡量与等同。因此，无论是基于外缘性分析还是对于内在理路的分析，南洋华人的革命认同，同南洋华人的身份认同一律，经历了在地化与特殊化，并且，受到

不同华人个体的情感取向与中国的人际网络的影响。

项目基金

本文为“马来西亚华人的华文教育、族群认同与多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

REFERENCES

- [1] Zhang Yong Fu. (2013) *Nan Yang Yu Chuang Li Min Guo* (Nanyang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n Yat 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Singapore.
- [2] Lim Nee Soon. (2015) *Xing Zhou Tong Meng Hui Lu* (Sin Chew Alliance Meeting). Sun Yat 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Singapore.
- [3] Lee Guan Kin. (2001) *Dong Xi Wen Hua De Zhuang Ji Yu Xin Hua Zhi Shi Fen Zi De San Zhong Hui Ying: Khoo Seok Wan, Lim Boon Keng, Song Ong Siang De Bi Jiao Yan Jiu* (East-West Cultural Clashes and Three Responses by Singaporean-Chinese Intellectual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pp.179-180.
- [4] Mo Mei Yan. (2011) *Jiang Wan Qing Yuan Ti Sheng Dao Shi Jie Ji —Fang Sun Yat 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Zhu Xi Zhong Sheng Jian* (Elevating Wan Qing Yuan to World-Class —Interview with Sun Yat 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President Zhong Sheng Jian). *Lian He Zao Bao*. 2011.10.6. p.11.
- [5] Zao Chuan Suo Gong Hui Xin Dai Biao Ming Dan (List of New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hipbuilding Trade Union). *Shun Pao*,1936.4.21. p.13.
- [6] Xuan Sheng An Zhen Cha Zhong Qian Ji Jie Jian Ren. *Shun Pao* (Lead and Interview in Investigation of Xuan Sheng Case),1936.10.4, p.12.
- [7] Hong Yi Jing. (2011) *Hua Qiao Wei Ge Ming Zhi Mu Yu Chu He Chu?* (Where Did the Saying Overseas Chinese as the Mother of the Revolution Come from?). *Lian He Zao Bao* (Editorial). 2011.10.6. p.16.
- [8] Xie Yan Yan. (2011) *Wan Qing Yuan Xi Ri Zhu Ren: Zhang Yong Fu* (Former Master of Wan Qing Yuan: Zhang Yong Fu). *Lian He Zao Bao* (Editorial). 2011.10.6. p.22.
- [9] Tong Qiao Ai Dao Zhong Shan Xian Sheng Si Zhi Zhang Yong Fu Jun Zhi Zheng Wen (Essays from the Four Records of Zhang Yong Fu by Overseas Chinese in Mourning for Sun Yat Sen). *Nanyang Siang Pau*. 1925.3.19. p.3.
- [10] Xie Yan Yan. (2011) *Zhang Yong Fu: Tu Sheng Tu* Zhang De Xin Hai Ge Ming Xian Qu (Zhang Yong Fu: Homegrown Pioneers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Lian He Zao Bao* (Editorial). 2011.10.6. p.21.
- [11] *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1939) *Zhong Yang Dang Wu Gong Bao* (Volume I No. 14). Nanjing Press, Nanjing. p.19.
- [12] Zhang Yong Fu Jiang Fu Yue Nan Tui Xing Qiao Wu Gong Zuo (Zhang Yong Fu to Promot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in Vietnam). *Qiao Sheng* (Volume IV, Issue 11). Beijing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 Beijing. 1942. p.47.
- [13] Chu Jian Wei Yuan Zhang She Yan Jian Bie Zhang Yong Fu (Chairman Chu Gave a Banquet and Farewell Dinner Zhang Yong Fu). *Qiao Sheng* (Volume IV, Issue 11). Beijing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 Beijing. 1942. p.47.
- [14] Feng Zi You. *Feng Zi You Hui Yi Lu: Ge Ming Yi Shi* (Memoirs of Feng Zi You: A History of Revolution). Dong Fang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2011. p.133.
- [15] Wong Sin Kiong. “Meet Lim Nee Soon” Lecture. Singapore. 2019.10.5.
- [16] Zhang Yong Fu Wan Chen Jiong Ming Lian (Zhang Yong Fu’s Elegy Couplet for Chen Jiong Ming). *Nanyang Siang Pau*. 1933.10.17. p.15.
- [17] Tung Yen. (1948) *Zhong Guo Guo Min Dang Er Shi Nian Shi Ji* (Histories of the Chinese Kuomintang in the Past 20 Years). Cheng Chung Book Company, Shanghai. p.592.
- [18] Zhong Hua Ge Ming Ji Zong Wu Bu Fu Qiu Ji Xian Xi Ping Shu Ge Pai Yi Jian Bu Tong Zhi Yuan Yin Han (Letter from General Affairs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oundation on Reasons for Different Opinions). *Ge Ming Wen Xian* (Volume 45). Party History Committee of the Kuomintang, Taipei. 1969. p.623.
- [19] Zhang Yong Fu Tong Dian Qing Jiang Xia Ye (Zhang Yong Fu calls Jiang to Step Down). *Nanyang Siang Pau*. 1931.5.29. p.6.
- [20] Zhang Yong Fu Fa Dai Dian Gao Bei Ping Wang Jing Wei (Zhang Yong Fu sent the telegram to Wang Jing Wei in Peiping). *Nanyang Siang Pau*. 1930.7.24. p.6.
- [21] Pan Jie Jun Deng Zhi Zhang Yong Fu Jun Gong Han (Official Letter from Pan Jie to Zhang Yong Fu). *Nanyang Siang Pau*. 1930.5.14. p.7.